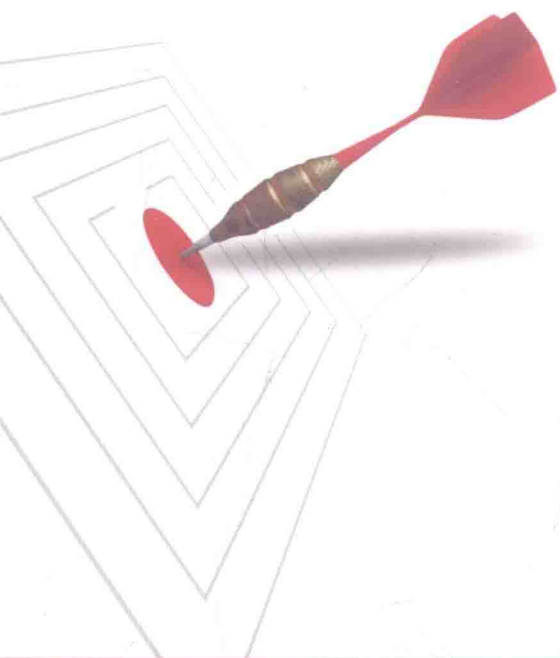


没有 市场失灵 这回事

谢作诗
著

市场可能缺失，但不会失灵
只要它存在，就一定最有效率、最公平



聂圣哲、刘轩华作序力荐

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用生活中的事情来说明经济学的逻辑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没有 市场失灵 这回事

谢作诗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市场失灵这回事 / 谢作诗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177-0591-8

I. ①没… II. ①谢… III. ①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①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4279号

书 名: 没有市场失灵这回事

著作责任者: 谢作诗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591-8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535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zcb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子邮件: 179788905@qq.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聂圣哲 序

| 学问是为社会进步服务的 |

《没有市场失灵这回事》收录了谢作诗教授这些年对中国经济现象、特别是市场“怪象”的随笔、简评，文章言简意赅，把似乎毫不相关的经济现象的相关性寻找出来，使得有些困惑我们很久的问题迎刃而解，有些短评的阅读体验简直可以用醍醐灌顶来形容。

“没有市场失灵这回事”被作为本书的书名，看得出作者的忧虑，更体现出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当下中国经济之乱象，使得普通百姓开始怀疑起市场经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公开指责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甚至成为一种时髦论调。读完谢作诗教授的《没有市场失灵这回事》，你不仅能明白当下许多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更能明白，没有市场失灵这回事！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支撑市场经济这个平台的各个要素上，如法治、诚信、私有产权不可侵犯、对偷盗的零容忍……或许，也包括文化的更新与文明的宗教信仰的建立。再好的平台，如果支撑物出了问题，这个平台也不可能稳固。所以说，市场不可能失灵，除非是支撑市场的支撑物出了大问题。

细读《没有市场失灵这回事》，你会发现书里几乎每一篇短文都可以按照当下流行的“学术”范式，“洋洋洒洒”写出万字以上的论文，在国内外著名学术杂志上发表，放入图书馆，收入目录，被他人写“学术”论文时不停地引用。这样既可以在日益八股化的学术领域不断攀升地位，

聂圣哲（1965~），安徽休宁人，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德胜洋楼有限公司总监，创立“德胜管理体系”。任同济大学、哈工大、上戏等校特聘及兼职教授。

又能得到各种奖赏和回报。如果这样，那真是一种悲哀。不幸的是，这种悲哀每天在成千上万的学者身上发生；而幸运的是，谢作诗教授没有这样做。他所做的学问符合人文关怀的第一原则：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明白文中含义，尽最大努力让读者花最少的时间去透彻理解叙述的内容。谢作诗教授这样做，回归了学术的本质——学问是为社会进步服务的。

实际上，认识谢作诗教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他做学问的动态。他学术研究的独特切入点，总是逼近实际的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谢作诗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我心中的形象已经基本定型：他是一位纯粹的、不受世俗污染的学者，具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对社会经济现象，甚至社会上的一切现象极为敏感。有许多貌似和经济学“无关”的事情，他都试图找出经济学的根源。令人佩服的是，大部分情况下都被他找出来了，他甚至给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谢作诗教授是一位善良、诚恳、有着扎实经济学基础的学者。他对所有读者都由衷的尊重——从不装神弄鬼，而是用尽量简短浅白的语言，来表达深奥的道理。并且，他深深懂得，行文一旦冗长就会使人厌倦——仔细阅读他的文章，你会觉得文中多一个字他都不愿意。这些，都彰显出谢作诗作为一位人文经济学家的本分。

坦诚地讲，我也从本书学到了很多知识，明白了不少以前没有想通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谢作诗不仅学问到位，而且语言文字驾轻就熟，有时娓娓道来，有时极其幽默，让人捧腹不已。该书不仅可以作为经济学者的参考著作，也可以作为大众读物。由于我在管理领域有一定的阅历，所以我要特别指出，作为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如果能够通读本书，对修正某些固化的观念、厘清新时代的管理思路也是大有裨益的。

没有市场失灵这回事——这是接近于真理的论述！

聂圣哲

2016年2月17日

于姑苏城外改华堂

刘轩华 序

| “私有确权”是人类最智慧、最道德的制度设计 |

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必须是不依附任何机构、不讨好任何人（包括权贵和民众）的人格独立的人。在当今中国，谢作诗教授就是人格独立又掌握经济学精髓的为数很少的几位学者之一。他大胆发表自己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在与他的多次交流与讨论中，我发现他的生命中似乎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即“用经济学的原理来探寻社会真理，唤醒更多的人创造财富，远离恐怖、暴力与掠夺，最终得到社会的认同”。这也许是他的自利，但他的这种自利是伟大的，这也正是许多人十分尊敬他的原因。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用经济学原理解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用每一件事情来说明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每一篇文章都通俗易懂，而又见解深刻，看完后让人有豁然开朗、醍醐灌顶之感。对许多不了解经济学的人来说，本书无疑是一部难得的经济学通俗读物。

譬如，他用自己随性的西湖闲游所见所闻，来说明有闲阶层和富有阶层在这个社会存在的必要与美好；他认为美女就该嫁“富豪”，让美女选择“穷光蛋”才不道德。人性是自利的，当然这种自利的基础是以不损

刘轩华（1970~），湖南邵阳武岗市人。江南财富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天瑞华商（基金）全国联盟主席，“圆道”理论创始人。

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去指责和干涉。美国的俄裔作家安·兰德（Ayn Rand）说过：“理性的自利就是美德。”

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学家预测的经济形势基本上都与事实截然相反，这只能说明这些经济学家是掺了水分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独立学者。谢作诗教授则不然，他对经济的预测，准确性是令人吃惊的，譬如，这次他对中国股市走势的分析就非常准确：“120万亿的M2，缺钱吗？不缺！房价涨，股市可能缺钱；房价不涨了，股市怎么可能缺钱呢？房价不涨，只要不是崩盘，对股市就是利好。120万亿，什么股市不能托起来？股市缺的是题材，缺的是好制度，缺的是信心。只要改革能稳步推进，那么股市向好的趋势就可以基本确立。”（摘自2014年7月“股市的春天正在悄然到来”一文）到2015年4月17日，中国的上证指数已经飙升到4287.3点了。这只是他精准分析的一个例子。这些当然得益于他的经济学功底，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他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and 正确的价值观使然。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说：观念、观念，只有观念可以照亮黑暗。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微信群，群中我们讨论最多的是用经济学的思维去分析与思考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个群里有不少国内知名的学者与企业家，在讨论中经常为了某一个具体问题争论不休。譬如关于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有人认为目前中国信仰迷失、权钱交易是因为“猫论”的误导、是市场经济惹的祸，因为只要有钱就是“大爷”，不分坏人好人了；也有人认为邓小平的“猫论”是非常正确的，这个理论在当时的环境下，告诫人们不要再争论姓资姓社，要把精力放到财富创造、经济建设上来，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劳多得，从而为中国改革开放找到了理论支持。

不难看出，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知识体系的冲撞。前者基于《资本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阶级总是存在，财富总量不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剥削，

才会有一个平等的世界。后者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中国目前信仰的丢失、对权钱的膜拜，并不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错，而是市场化不彻底的错，是中国人普遍法治意识淡薄的错。他们认为只要人身是自由的，就不存在剥削，通过分工和专业化，财富会爆发式增长，大家会共同富裕，不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

谢作诗教授在本书中重点谈到了“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契约经济，法治的地位因此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恰恰说明了，不是邓小平的“猫论”，而是市场经济需要的法治秩序的缺失，让中国人好坏不分、信仰迷失。

市场与法治的基础，是私权的确立。如果个人财产不能确权，市场与法治只能吊在半空中，无法落地，也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我曾在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2群，看到吴晓波先生发的《经济探底下的总理自信》一文，其中提到了他给总理提出的一条建议：优化扶持政策，政府资金与风险投资融合。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原来政府的扶持资金，基本上是领导签字批给那些整天围着自己讨好自己的圈内人的。既然这些公司可以轻松地得到这笔资金，为什么还要付出巨大努力去冒险、研发好产品讨好消费者？如果政府资金与民间资金融合，就会有利于政府搭民间资金的便车，因为民间资本是人家身家性命的投入，当事人一定会认真调研，审慎决择，绝不会轻易出手的。这个主意实际上属于PPP制（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一种。

2015年以来，中国在推行PPP制，这本来是市场化的一个很好的模式，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走了样。原因是官员与民营企业对市场的理解不一样，他们认为市场必须听政府的才行。2014年有一个案例：某省政府部门有一笔创业投资基金，按国家部委文件规定，必须由民间资本主导，市场化运作，但双方在讨论董事长、董事会席位、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投决机制时，政府却提出来董事长必须由政府委派，五个董事席位政府要占三个，七个投资决策委员会政府要控制四个。总经理可以由民间资

本提名，但财务、副总以上人员必须由董事会任命。政府方认为总经理让民间资本派人担任这就是市场化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市场化意识已经非常强了。其实，这哪里是市场化，骨子里还是政府控制的PPP制。结果可想而知，一定是失败，给人的感觉是国务院提出的PPP制不可实施，市场化是行不通的。

问题出在哪里了？出在没有真正理解市场的理念上。想一想，如果董事会、投决会都是由一批自己没有投资、没有市场实践经验的国有资本代理人来决策，他们做出的决策能符合市场需求吗？他们能承担什么责任？一旦决策失误，买单的是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如果要其承担责任，他们还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让民间资本背黑锅。这怎么可能是真正的市场化运作呢？

私权与公权的博弈还在旧的理念下延续，这种博弈也许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我想，谢作诗教授通过本书所表达的，就是希望老百姓的基本权利能得到保障，不受侵犯，让万物以自由求发展。

刘轩华

2015年4月26日

自序

| 只有市场缺失，没有市场失灵 |

柴静的雾霾调查片引发了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极大关注。我就借这股东风，谈一谈环保及其相关的市场失灵话题。

市场既有效率又让人人都满意

滥施化肥，是破坏环境；滥伐树木，是破坏环境；滥排污水、烟尘，也是破坏环境。可是，完全不施用化肥，不砍伐树木，不排放污物，虽然对环境没有破坏，但也意味着没有生产，人类也就无法生存。人都没有了，再好的环境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引出如下重要的问题：“滥”的标准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会在那么多领域犯“滥”呢？

假如土地私有，那么你不会过度使用化肥，以致损害了土地的肥力；假如山坡私有，你不会过度砍伐，以致山坡的价值受到损害。在使用资源的过程中，只要使用资源所带来的价值，大于对资源所造成的损耗，那么就不是滥用。反过来，因为化肥使用不足、砍伐树木不够、排污受到过度限制，从而减少了资源的总价值，这其实也是滥用，是另一种形式的滥用。

“滥”与“适度”如何评价呢？农民在自留地里多用农家肥，在包产

田里则多用化肥；在自留坡上辛勤栽树，却在集体的坡上大肆砍伐。农民在包产地里所施的超过自留地的化肥量，就是滥施的化肥，在集体坡上砍伐的超过自留坡的木材量，就是滥伐的树木。这也告诉我们，造成滥施化肥、滥砍树木的原因，是产权没有被界定为私有。

只需把产权清晰界定给个人，至于界定给谁无关紧要。通过市场交易，资源最终会落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餐厅是我的，我不吸烟，而你却烟瘾难耐，只要给我称心的补偿，我就会让你吸烟。反过来，餐厅属于烟鬼，如果我对空气的评价更高，那么我可以出价把空气的使用权买过来，不让他吸烟。两种产权状态，烟雾的产生量有差异吗？完全没有。

由于卖出权利的一方得到了称心的补偿，而支付补偿金的一方也是自愿的，因此每个人都是满意的。基于市场和市价的交易不仅有效率，并且能让各方一致满意。

环保历来被当做是市场失灵的例证，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环保的困难，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市场缺失。市场有前提，即产权要清晰界定给个人。不能把产权没有清晰界定给个人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滥施化肥、滥砍树木等所谓的环保问题，其实是没有把产权清晰界定给个人导致的后果。

但是界定产权有成本，在有些情况下成本还高不可及，因而可能无法把产权清晰界定给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在空中做一面高墙，以阻止烟尘飘向他人的领地；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河里建设堤坝，以阻止污水流向下游。这种情况下，环保就真的成为问题了。但这亦不是市场失灵，是没有市场发挥作用。

在没有市场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排放多少才是合理的，才不是滥排滥放呢？

对于不同的人，答案显然不一样。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可能宁愿少一点GDP，也要清洁一些的空气，而宅男宅女可能正好相反；河岸边的人会选择要清澈的河水，但是远离河流的人可能会选择要GDP。那么谁来决定排

放的数量？

同样的人群，选择不同的决策机制，答案也会不同。一种办法是全体人民投票决定，但这个办法费用实在不菲。替代的办法是由全体人民选择政府，由政府来决定排放数量。放任不管，任由企业和个人随意排放，也是一种选择。极端地说，抓阄决定也是一种选择。决策机制不同，排放水平显然是不同的。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决策机制呢？

可惜经济学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经济分析既不偏重、也不反对改善环境。经济学既不断定哪部分人的意见更重要，也不断定哪种决策机制应该被采纳。然而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稀缺性和替代选择无处不在，即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环境好一些，就要减少一点产出，或者多支付一点费用，反之亦然。当然这种替代并非总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经济学还能告诉我们，只有在市场决策的情况下，才能既反映环境保护的代价，又让每一个人满意。

或许，你会质疑市场决策对穷人不公平。其实这种说法一点道理都没有。市场给你自由，你可以创造财富，但是不能要求财产平等。经济学还能告诉我们，追求财产平等，那么就不能有自由，人权也不能平等，最终财产权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平等。这样转一圈回来，我们会发现，其实只有市场对穷人才是最公平的。

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有可能，就应该选用市场决策的道理。这也是市场化改革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原因。如大家所见，但凡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无一例外都高。

市场虽好，却也昂贵。市场不仅需要产权有清晰的界定（而这需要不菲的成本），而且还要求谈判、签订协议等交易费用不能太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使用非市场决策的原因。

市场可能缺失，但是只要它存在，就一定最有效率、最公平。市场决不可能失灵。

环境保护的困难

如果能够使用市场，环保问题也要尽可能用市场来解决。这就是我们大力提倡排污权交易的原因。事实上，美国一些地区已经实行购买排污权的措施，比如企业必须付费，才能释放硫化物。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反映污染和环境保护的代价。不至于因为环保而牺牲有价值的经济物品的生产，也不会因为生产不值钱的产品而牺牲环境。如果一种产品其价值极高，但生产时会产生大量污染，那么厂家可以向生产低价值产品的人购买排污指标。那些生产低价值产品的厂商，就会选择停产或少生产，而把排污指标卖给前者。污染物不是经济物品，并非人们对它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交易。只要产权界定清楚，交易一样会发生。

能够用市场解决的都不是公共问题。无法完全用市场解决的，多少都有公共决策的性质。

可以引进排污权交易，但排污总数量无法用市场来决定。因此环保问题多少都要涉及非市场的公共决策。但是没有市场来发挥作用，该如何确定污染的代价呢？

可不可以借助科学来计算污染的代价？

以雾霾为例。按照米歇尔·C.特纳（Michelle C. Turner）等人的研究，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的PM2.5浓度，会导致肺癌死亡率上升15%~27%。按照这个算法，仅大气污染一项，就导致中国的肺癌死亡率比欧美高出300%以上。但在实际情况中，中国的肺癌死亡率虽然略高，却远未达到如此夸张的程度。这说明，雾霾与肺癌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容易计算。

雾霾的危害到底有多大，这在科学界并没有定论，现有的条件也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就PM2.5的浓度而言，云南是全国环境第二好的地方，而北京则是倒数第二。然而，北京和云南的人均寿命却恰好倒了个个儿：北京全国第二长寿，平均寿命80.18岁；云南则倒数第二，平均寿命

只有69.54岁。这就是经济发展、医疗资源增长带来的好处，它抵消了环境带来的危害。

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健康的影响要远远超出雾霾。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哪怕再环保，其平均寿命也要比污染大省低。在中国，东部省份平均每个人能比西部多活十几岁。事实上，如果做回归分析的话，各省的PM2.5浓度和人均寿命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就是PM2.5越高的地方，人均寿命可能反而越长。这并不是说PM2.5对健康有好处，而是说在污染高的地方，往往经济也比较发达，发达的经济对人们健康的补偿要大于污染带来的损害。因为人们有条件定期体检，及时治疗疾病，并能接受更好的医疗服务。

更复杂的在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可能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计划经济的时候，生活水平比现在低很多，然而我们不得不闻刺鼻的煤烟味，因为只能低效率地散烧煤炭。工业化、城市化不仅提高效率，而且还因为是规模经济，可以集约化治理环境。再者，成本收益的计算要考虑到各地、各人，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这个地方生产钢铁水泥产生污染了，别的地方土路变水泥路，扬尘大幅减少了；城市的污染增加了，然而农村山青水绿了。这些代价与收益，并不能科学地算出来，否则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

然而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很难计算雾霾的代价。就算能够科学清楚地计算出雾霾的代价，人们的主观评价也可能大相径庭。

公共决策的存在是因为产权不能完全界定为私有，它还存在外部性。多数时候不得不赋予政府或某个委员会权力，委托其做决策。然而权力同样存在外部性，甚至可能更严重、更加不容易纠正。没有理想的公共决策机制。环保问题比较可行的办法可能是大多数人满意原则。这并不是说大多数人满意就最优，而是这个原则比较可行。当然实际的决策机制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

但即使是全民投票，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因为投票行为同样存

在外部性。

这就是公共决策的困境：其结果既不能完全反映代价，也不能让各方一致满意。公共决策只能是用一种有外部性的行为去纠正另一种外部性。正因为如此，普通的商务谈判容易达成共识，但是关于环境、大气的谈判就很不容易。

因为公共决策存在上述困难，没有标准答案，所以面对公共话题我们就要多一些包容。

中国的问题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确不容易做取舍抉择。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地方，改善环境不但不影响经济发展，反而还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就没有理由不支持吧？

不看柴静的调查片，我不知道凌晨的污染比白天高峰时还要严重。其原因居然是夜间向城市运送物资的柴油大卡车没有任何减排设施。这些车每辆的排放量是达标车的500倍，三万辆车进城，相当于几百万辆车夜里在不停地开。交通部门说：车是新买的，还贴了环保部门的合格标识；况且物资保障车不允许处罚。车主说：咱也不懂这个，咱只是个买车的，买的是贴了国家合格证的车。车企说：别人造假，我不造假就活不了；如果严格执法，抓那些造假的，我保证第二天就生产真的。环保部门说：大面积造假，或者说全面造假，在这个行业不是秘密；我们连嘴都不好意思张，怕别人看到自己没有牙齿。

《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写明只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的缺陷车辆，才召回或者销毁。没有排放设施跟生命财产安全有什么关系？所以没有召回的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可以销毁或者强制罚款，但法律制定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被使用过。因为法律规定必须由“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执法”，却没有写明执法主体。环保部说：听说不是我。工信部说：绝对不是我。质检总局说：应该是我们三个吧。全国人大说：这条法

律执法主体确实不明，当初立法的时候，很多部门反对，法律通不过，所以只能是这样一个模糊的说法。滑稽不？！

车企还说：我们国四的标准早就已经确定，但是国四的油品迟迟不供，供上来的品质也不高。国内最好的柴油，其污染物排放量是美国、欧盟、日本的25倍。汽油标准则长期比发达国家低两到三个等级，而提高一个等级就可以减少10%的排放。那么为什么不把油的质量弄高一些呢？因为国家标准本来就不高啊！企业都是逐利的，没有理由要求企业超越国家标准供给更好的油品吧！为什么不把标准定得高一些呢？原来制定标准的是石化行业的人。而分歧则在钱上，环保部门说国三升国四一升涨7分就够了，石化部门说得涨5毛。发改委、财政部也抱怨：人家是副部级单位，谁买你的账啊。人家涨价报告上来，不涨就断供了啊。

不可否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替代关系，但是没有任何减排设施，肯定有些过分！

也不可否认，简单向发达国家高标准看齐未必就好，但让行业内的人自己制定标准也不对吧！

那个中石化前总工程师、石油标准委员会主任，口口声声说，标准不能由不懂炼油企业的人来制定。对于为什么不提高油品标准来倒逼油品升级的问题，人家的回答是：若升了，因为断供引起社会不稳定，谁来负责？再问：把油品市场彻底放开，这样就不存在断供的问题了吗？人家答：弄不好就出大事，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做油品的。可是，发达国家油品放开怎么就没有出大事？难道你们的油品比阿猫阿狗做的好？

退一步讲，我们不去与发达国家比油品质量。我们也不问，纽约、东京人口密度比我们大，人均车辆拥有量比我们高，为什么他们的空气质量比我们好。我们只问，能不能让我们以发达国家的低价格用上我们国家的低品质油呢？千万不要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做不到哟。炼油技术是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满足一价定律，即不考虑运输费用、关税等壁垒，那么同一商品在世界不同地方以同一种货币标价，价格是一样的。在

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油品质量比发达国家差，价格则比其高，这是否需要反思？

诚然，只是放开准入，让市场竞争，未必就能解决油品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有好的环保标准，还要有对执法的有效监督与约束。绝不是简单赋予环保部门执法权的问题。过度排放可能是环保部门被贿赂收买了，也可能是书记、市长为了保经济而限制环保部门执法了，这都是权力过大、不受监督约束的问题。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约束，那么赋予政府权力，不但不能解决环保问题，而且还可能扼杀经济。环保问题之难，难在其外部性，然而世界上最大的、最难消除的外部性，不是别的，是权力。

河北是钢铁大省，也是燃煤最厉害的地区。一吨钢铁只赚一个鸡蛋的钱，政府居然还大规模补贴，并且继续将钢铁作为支柱产业。调查片说，有个企业政府每两年补贴其20亿元。政府和企业的理由冠冕堂皇：十几万人的就业是大问题；城市化还会继续，只要城市化继续，这些产能就会被消化。

对于第一个理由，我想问，补贴的钱从哪里来？你政府不会扁钱吧，你不补贴这个亏损企业10亿元，就不用每年对别的好企业征收10亿元的税，那个好企业会扩大生产，这不仅能够更好地产生经济效益，还能更好地解决就业，并且可以减少污染。

而更让人觉得好笑的是，这个钢铁企业拿到了政府的补贴后，竟然进一步建新厂扩大生产。

中国为什么产能过剩？不是因为政府规划不够好、管制不够得力，而是因为产权公有、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官员和国企高管花的是别人的钱，花别人的钱总是多多益善。政府和国有企业不搞投资，钱怎么落到官员和国企高管的口袋中？所以，又要国有企业，又要政府干预，又不要污染，这怎么可能？

中国需要深化改革，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把电价、气价降下来，让人们少烧散煤。